

纳溪县文史资料选辑

第四辑 (征粮剿匪专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纳溪县委员会
纳溪县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目 录

编者前言	(1)
留耕征粮	曹杰秋 (3)
解放初期纳溪县匪患始末	龙政举 (22)
疾风扫残叶	李毓江、黎成久 (32)
一、合面区剿匪记	
二、绍坝区剿匪史要	
护国区土匪暴乱记要	
.....赵光前 高树云供材 赵斐亚整理	(61)
鼓楼从此不闻刁	李毓江、刘骈臻等 (70)
鼓楼山史闻	张志钦、巫显咸 (82)
江北区征粮剿匪概况	丹枫 (93)
暴行	克茹 (98)
剿匪日记片断	张桂林 (103)

军民共布罗网·····	谢树荣 (110)
渠坝烈士墓·····	刘裕生 (118)
怙恶不悛者的下场·····	王平 (122)

编者前言

春天，百花争艳，万紫千红，空气里弥漫着芬芳馥郁花香，是一年中最美丽的季节；春天，万物复苏，万象更新，大地呈现一派生机，是最富有生命力的季节，也是人们最喜爱的季节。在这个季节里，农民奔忙田间，商贾结伴旅途，牧童横笛牛背，墨客吟诗踏青。然而，纳溪一九五〇年的春天，却一时妖风滚滚，疮痍满地，客旅不行，路断人稀。刚刚解放的纳溪，百废待兴，党、政、军、民都忙于新政权建设，地方上的反动势力不甘心灭亡，与国民党遗留下来的社会渣滓、散兵游勇结合起来，上山为匪。他们攻打区、乡政府，杀害无辜，抢劫民财，焚房烧屋，劫夺粮库，袭击商贾，拦车截船，无恶不作。

为了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保证人民政权顺利建设，纳溪县委领导全县军民与匪徒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几经较量，邪不压正，短

短的几个月，就彻底消灭了匪患。剿匪战斗中，一些同志献出了年轻的宝贵生命。

创业艰辛，胜利不易；今天社会主义幸福，昔日烈士鲜血浇灌！前人造福，后人不忘，这本《专辑》（还准备出），聊以对在征粮剿匪中牺牲的烈士们的纪念。

深感遗憾的是，这一工作做得太迟，烈士的姓名、事迹，绝大多数已失散，虽经多方努力调查，仍未能查清。我们诚恳期望了解情况的同志赐稿赐教，使烈士的英勇事迹世代传下去。

由于我们水平有限，纰缪难免；也因岁月流逝，虽当年亲历剿匪之同志，也记忆不清具体时间，文中提到的日期，可能有误，希望参加过征粮剿匪的同志和知道详情的同志加以订正、补充；更期望读者赐惠纠缪！

留耕征粮

曹杰秋

一九四九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过江，直捣国民政府老巢，蒋介石慌了手脚，从“幕后”跳到幕前，飞到重庆亲自调兵遣将，妄图以西南几省，特别是川、康为根据地，苟延残喘，待机反扑。他立脚未稳，解放军逼近重庆，又匆匆忙忙逃到成都。

蒋介石在重庆时想“守”四川，到了成都因“守”已不可能，就政守为毁。他在成都住了十天，干了三件事：除残酷屠杀共产党人及爱国民主人士和安排炸毁成都外，最重要的一件事是布置“应变”，组织军、警、特务、社会渣滓上山为匪，继续与人民为敌。由于蒋介石飞离大陆前施如此之“德政”，所以四川解放后，匪患蜂起，胁众之多，涉及面广，危害之大，在全国实属罕见。

为保障人民政权正常工作，为保护人

民生命财产安全，必须首先清除国民党遗留下的残渣余孽。人民解放军解放四川后，在乘胜挺进的同时，抽调部份部队，配合地方政权，剿灭土匪，扫除国民党残渣余孽。部队调动十分频繁。

俗话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为支援解放战争取得彻底胜利和保证革命建设的最低需要以及剿匪部队生活的供应，必须准备充足的粮秣。国民党政府经常是寅吃卯粮，粮库空空，因此征粮就成了新政权的 首要任务。但是，征粮必先剿匪，不剿匪就不能顺利征粮。所以五〇年春、夏季，川南一带的工作主要是征粮剿匪。

在土匪猖獗时，一九五〇年四月，我和六个同志到了纳溪，分配到四区（区署设留耕）工作。四区辖留耕、蟠龙、底蓬、大妙四个乡（后大妙又划给三区），原属叙永县，才划给纳溪不久，还没人去接收。我们七个同志到达纳溪后，县委任命老地下党员欧志修同志为四区副区长，由县大队调一个班，在欧区长率领下去留耕，路上顺便打了一股散匪，捉了七八个人，缴获几挑物资；物资由土匪挑着，战士押着，区政府干部跟着，可谓浩浩荡荡走马上

任。

由于国民党时的封建割据，毗邻地区寸土必争。叙永县划过来的几个乡都和江安县地插花，每个场镇都是部份属江安，部份属纳溪，犬牙交错，飞地很多。留耕乡同样有两个乡公所，一个是江安县留耕乡公所，一个是叙永县留耕乡公所。江安县在留耕设区署，叙永县的区署设在底蓬。我们到留耕后，只好和叙永——已改称纳溪县留耕乡公所住一起。乡公所人员全是国民党政府遗留下来的，乡长、乡文书家在留耕场上，都在家住；乡公所只住有一个乡队副和十几个乡丁。这支武装还没经过改造，既要用他们，又要防备他们。

留耕周围的土匪很多，也很猖狂。在我到达留耕的前两天，土匪数百人包围江安县留耕区公所，经江安县大队救援，打退土匪，区公所人员脱险，随县大队撤回江安。我们到留耕后，曾到江安留耕区公所看过房屋，在一间房子里还看到血迹，说明有人在那里负了伤。

叙永县在底蓬区的工作人员因匪情严重，早已撤回叙永。我们到留耕后，没人给我们办移交，除了有十几个乡丁、十几支枪外，一无所有。匪情严重、环境复杂、情况不明，这就

是我们到留耕后的处境。

当时首要的工作是征粮，但无任何资料，如何着手呢？我们只知叙永县人民政府早已发了征粮通知单，通知单存根在叙永，在兵荒马乱的情况下，不可能丢叙永拿存根。于是，欧区长把留耕乡乡长李希伯找来，问他征粮情况。他说：“区发下来的征粮通知单没有存根，经乡公所转发给保甲长，早已发到户，因为没有存根，全乡该交好多粮也不知道。”不知他是要滑头或是说的真实情况，对他无可奈何。还是欧区长办法多，他要乡长通知保长开会。

在保长会议上，欧区长说：“征粮通知单发下很久了，由于留耕区由叙永划给纳溪，在办理交接时期中两县在留耕都没征粮；现在区政府成立了，从明天起，开始收粮。五日内，各保将本保交粮户名单及应交粮数造册送区，以后的交粮送度定期汇报；这是人民政府第一次布置的工作，你们是否跟共产党走，就看你们的实际表现”。

有个保长当即说：“征粮通知单是叙永县人民政府发下来的。政府有存根，我们没有存根；现在划归纳溪县，又不知收好多粮，这个名单如何造法？”

“政府当然有存根。”欧区长站了起来，炯炯的眼光直射刚才发言的保长，那个保长马上低下了头。他才接着说：“我们不是国民党的封建割据，是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政权，叙永、纳溪以及全国解放区都是统一的，都执行的是党中央制定的统一政策，无论留耕乡划归哪个县管辖，已发的征粮通知单同样有效，数字不会变更；叙永还没把存根交给我们，但很快会交给我们的。”说着话，他那略带威严的眼光不断巡视保长们的表情。好象打靶一样，他的眼光射向哪个保长，哪个保长就局促不安地低下了头。欧区长意识到会场过于严肃，才笑了笑说：“一份名单就把你们难着了，你们找甲长要么！甲长自然会找老百姓要；这是老办法，未必忘记啦？”一句话使会场气氛顿时活跃起来，他反而加重语气说：“这是第一次给你们交待的工作，干不干由你们；你们不交征粮名册，我们照样征粮，信不信也由你们！”

一个保长忙不迭的说：“相信、相信。就照区长说的办，找甲长要，征粮通知单是经甲长送到各户的，甲长最清楚；这事好办，好办。”

收集一下征粮通知单，照通知单送个花名

册，一个甲十几户人，似乎并不是什么难事。可当时解放不久，伪政权人员对我党政策不了解，惶恐不安，又加上土匪猖獗，乡保人员脚踏两只船，真心为新政权办事的旧乡保人员微乎其微。所以，保长会虽然开了，但送来的花名册不多，两且是残缺不全的。

我们知道，保长是靠不住的，只有深入下去发动群众，才能摸清情况。于是，我们几个干部轮流下乡边摸情况边催粮。因区政府人少，无法到蟠龙、底蓬乡去，只有在留耕乡附近几个保催促。

为了预防土匪袭击下乡催粮人员，欧区长想了个办法，他找留耕乡乡长交待：“我们到各保征粮，你派乡丁带路；若出了问题，乡丁负责，你乡长更要负责。”乡长不敢答应。欧区长说：“乡丁都是本地人，你布置他们多打听情况，能下乡，我们就下去；如你们认为不宜下乡时，我们也可以不下去。”区长说得合情合理，乡长只好勉强答应。政区长为什么要用这办法呢？因他知道乡保人员中有不少人与土匪有瓜葛，对土匪的动态是较为清楚的，所以有意向乡长施加压力。这不仅便于我们下乡征粮，而对了解匪情也大有好处。土匪活动

距留耕近时，乡长就给我们打招呼：这两天最好不下乡。

留耕征粮中，虽然没受过土匪袭击，但那时下乡毕竟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明的、暗的敌人都在窥探我们，时刻伺机下手。

刚开始收粮时，交粮人不多，我闲着没事，也想下乡走走。有次，我去找一个乡丁，请他给我带路去四保（距留耕四，五里路）催粮。他听说去四保，犹豫了一下说：“去可以，但最好不要带武器。”我答应了他，但有点不放心，悄悄地揣个手榴弹；临走时我又喊区队的一个班长和我一路下乡；班长背起冲锋枪跟我走时，乡丁吞吞吐吐地说：“班长若是忙，就不必去啦。”班长风趣地说：“曹同志管粮，是后勤部长——大首长，哪有首长出门不带警卫员的。”乡丁面带难色看了看我，我装做没看见，和班长开起玩笑，边走边说，嘻嘻哈哈走出留耕场。

我们到了四保，保长姓王，见到我们，点头哈腰，请到他家正堂屋坐，点烟沏茶，问寒问暖。过份的“热情”反而显出虚情假意，我不愿和他寒暄，开门见山的谈征粮。他哼哼啊啊，谈不了两句又跑进踏出，不知是忙啥事。

和我们同来的乡丁却坐不安宁，保长一出堂屋，他也跟着出去。如此三次，引起了我的怀疑，我问保长：“什么事那么忙？”保长说：

“没啥事，没啥事，烧点茶请你们吃。”话音未落，保长的妻子和保长的妈妈端了几个盘子出来，摆在桌子上，盘子内装炒米糖、黄粑之类的点心。我说：“这是干什么？”乡丁说：

“这叫‘摆茶’——我们这里的风俗，对贵客要‘摆茶’招待，可你们解放军三大……”

我一听心头有点起火，认为乡丁和保长捉弄我们，一面“摆茶”招待，一面又捉三大纪律，我愈想愈气，猛然站了起来，指着保长说：

“我是下乡征粮的，今天来是通知你保赶快完成征粮任务；如完不成，后果由你承担！”说完，我不顾保长点头哈腰的解释，也没招呼乡丁，拉起班长离开了保长家。因我感到受了乡丁愚弄，没让他继续带路，和班长一路径直回到区里。

因这个保长在地方法上是一霸，在“清匪反霸”时，将这个保长抓了，给我带路那个乡丁才将那次来龙去脉的事情谈清楚。

乡丁知道那个保长通匪，得知我要到那个保去，不好阻挡我，只好劝我不要带武器，他

是怕带了武器反而遭土匪袭击。哪知他劝我不带武器引起我对他怀疑，拉着班长和我一道下乡。乡丁怕保长给土匪通风报信，所以到保长家以后就跟着保长。保长看到我们的冲锋枪，有点眼红，就一方面设法给土匪报信，一方面想用“招待”的办法拖着我们，等候土匪到来。乡丁知道保长没怀好意，所以故意用话激我们，不让我们久留，避免了一次事件的发生。

一切布置就绪，准备收粮时，才意识到区政府干部中没有一个管财粮的。谁来收粮呢？区委、区长临时决定由我当仓库主任，负责收粮。我们同来的干部中，只有我读过几年小学课本，文化“高”点；收粮要写要算，没文化不行，收粮任务就自然而然落在我头上。那时干工作，没有哪个挑肥嫌瘦，都是叫干什么工作就干什么工作，虽然我连算盘都不会打，还是勇敢地接受了这个任务。

收粮需要作些什么工作呢？天才晓得。所以第一天收粮就闹出了笑话。

保长会开过几天后，区干部又带乡丁下乡催粮，才有人开始交粮。有天吃过早饭，送来两挑黄谷，我马上出来接待，这时我才想起送

来的粮食应该放在哪里呢？转念一想，两挑粮食随便放哪里都行，收下再说；可是粮食收下既不能倒在地下，也不能倒在床上，更不能连粮带箩筐一起收下。人到急处办法多，我向送粮的说：“你们休息一下，喝点水，我去拿秤。”我想起有个保长在区政府门口住，就跑去找他，对他说，因收粮，要他马上借用一切装粮工具。这个保长很机灵，连说：“有、有，我马上送来，请你先回。”果然，他随后带着一个人，拿着斗筐，围包、斗等工具来了，问我放在哪里，我说暂时放在大厅里。我看着他没拿大秤，问他拿什么收，他指指斗说：“收粮就用这个呀。”我说：“不行，我们解放军领粮都是用秤，不用斗，用秤才公平合理。”送粮的和保长听到我这话后都很惊诧，不过送粮人是喜悦的惊诧，而保长的惊诧却明显带着惶惑不解的神态。

保长拿了一把大秤来，我把粮称了，这才想起没有收据，幸好我管区政府大印，开了一张临时收据给送粮人，言明以后换正式收据。征粮就这样开始了。

用现在的眼光，看过去的问题，很多事不可思议。收粮之前来作任何准备工作是不可思

议的，但第一天收粮就引起强大的反响，我当时也认为是不可思议的。

事情是这样的：两个挑粮人交了粮走到街上，看见熟人就说，人民政府和旧政府不同，旧政府用斗收粮，人民政府用秤收粮。

用斗和用秤有什么不同呢？讲究可大啦！国民党收粮时，把斗放在地下，交粮人向里倒粮食，倒粮食时收粮人用脚踢斗，使粮跌紧，粮食冒过尖，，收粮食人用斗轻轻一刮，才将粮食倒入仓内，明里是一斗，实际有一斗另几合，甚至有一斗一升。更为不合理的是刮落在地下的粮食，叫扫地粮，归收粮人所有，送粮人不准扫走，所以送粮的人如应交一斗粮，至少要准备一斗一，否则就交不够。现在人民政府收粮用秤称，秤又是街上借的，有一斤算一斤，真是新鲜事，引起群众兴趣，初步看到新旧政权的不同。这个消息，不胫而走，很快传遍四乡。用斗、用秤，虽有本质不同，但毕竟是一个小问题，受到人民热烈拥护的还是征粮政策。

四九年，国民政府已征过粮，因接近解放，交粮的人不多，因此解放后仍征四九年公粮，但征粮的原则、政策、办法都有本质的

不同。

人民政府征粮的原则是：田多多出，田少少出。政策是：按照阶级划分，实行合理负担。任务是：公粮人平七十二斤（全专区同）；附加粮百分之十；附加人民币七百二十元。方法是“旧派新摊”。所谓旧派”，系以各县原有的基本赋元为基础除以新的任务，得出新赋元；所谓“新摊”，是按阶级划分，实行合理负担。具体的计征办法是：地主（当时还未划阶级成份，以收租为生者为地主，收租六十石以下为小地主，六十至二百四十石为中地主，二百四十石以上者为大地主）按基本赋元累进征收（即加征）五至十成；自耕富农累进征收四至五成；中农减三成，征七成，贫农减七征三成；佃富农征收其收入之一成半或二成；佃农收入每人在二百斤中熟米以上者，征其百分之四，如正粮与附加粮的总任务均已完成，佃农可免征。（实际是佃农基本未征）

因国民党政府在四九年已征部份公粮，人民政府实事求是，按阶级成份对待：贫农、中农交的全抵，富农交的抵一半，地主交的抵三分之一。

新的征粮政策与国民党政府的征粮政策有